

论与批评丛书

权力

关系的
多重变奏

——官场小说的类型学研究

杜建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主编 葛红兵

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

——官场小说的类型学研究

杜 建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官场小说的类型学研究/杜建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7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葛红兵主编)

ISBN 978-7-5671-0139-5

I. ①权… II. ①杜… III. ①现代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264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编辑/策划 姜春明 江振新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小说类型理论与批评丛书

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

——官场小说的类型学研究

杜建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上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 字数 187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0139-5/I·156 定价：37.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将官场小说视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认为官场小说在历时性演化轴上自有其生成、发展、演变的脉络;而在共时性状态轴上官场小说又积淀了丰富的叙事成规和文化结构。正是本着这样的研究理念,笔者深入小说文本进行深描式的细读研究,挖掘出了官场小说内在的叙事成规与文化原型,并进而得以窥见官场小说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求凸显出官场小说作为中国官文化叙事智慧和叙事知识的集中体现者的面貌来。此外,笔者也对官场小说的创作与研究情况作出了价值反思,分析了作家的精神气质与小说叙事成规的关系,也剖析了官场小说与宪政民主建设二者的关系,以求对未来的官场小说研究与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总 序

本课题于200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09BZW014),但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实际研究。8年间参加此课题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有俞亚赞、叶祝弟、李瑞明、张永禄、徐秀明、肖青峰、谢彩、张默、侯学标、Raffaella Buonocore(英国、意大利双国籍)、许铭、许道军、陈佳冀、谢尚发、刘凤美(泰国)、杜建、王环环、毕旭玲等19人。除了我完成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专著之外,团队完成的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论文共18篇。除中国现代类型小说理论批评史、欧美小说类型理论史研究外,我们更多的是针对某个小说类型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武侠、言情、玄幻、官场、侦探、法制、都市、成长、历史、家族、民间故事(上海海洋故事)、动物叙事、恐怖小说等近20个领域。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类型理论的缺乏、类型学方法探索的困难是一个方面,同行的不理解也是一个方面,许多同行把“类型小说等同于通俗小说”,认为这是没有前途的领域,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初步成果也曾受到种种质疑。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这是一个建构新的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体系、建构新的当代小说批评方法的大命题。事实也正是如此,2003年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类型小说双年选》,公开提出“中国当代小说类型化发展趋势”的论断。之后,我们沿着故事形态学、结构主义思路,以“叙事语法”为核心概念,做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如恐怖小说、侦探小说、官场小说的研究等。随着类型学元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研究的

逐步成熟,我们又把研究重点扩展到“叙事成规”、“地方性叙事”与“民族志类型”、“方音类型”研究等方面,这个阶段我们还逐步提出了“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概念,这样,小说类型的嬗变规律的宏观研究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时,我们研究了武侠小说、历史小说、成长小说、言情小说、法治小说、官场小说等,并且把研究范围拓展到民间故事(上海海洋传说)、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等方面。

逐渐地,类型小说研究为社会所知悉认可,更多的同道和单位加入了这一领域。《小说评论》、《时代文学》等杂志邀约我们进行专栏讨论,《文学报》、《文艺报》开辟专栏讨论小说类型化及类型小说理论批评问题。2009年年底,我们团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支持,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和鼓励。

中国小说理论研究不发达,且当下中国小说理论和批评处于一种“用一种小说观念来研究和批判所有小说”的状况,能否建立一种真正的小说类型理论,进而在自觉的小说类型理论支撑下对小说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批评?这一工作事关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科学化”,事关中国小说理论和批评的“方法自觉”。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把“建构中国现代小说类型理论并进行分门别类的当代小说批评”作为本课题的最终目标。

晚清新小说家们抱着文学启蒙的理想,从西方大力引进新小说类型,如政治小说等,催生了中国现代小说类型化的滥觞。之后,中国现代出现了一批如管达如、吕思勉、鲁迅、郑振铎和胡怀琛等具有小说类型研究倾向的学者。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梳理古代小说类型的生成发展和历史“变形”,体现了小说类型学的部分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化产业市场化时期的到来,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类型化发展的趋势。传统类型如武侠、言

情等得到长足发展,新类型如玄幻、穿越等不断产生,催生了中国当代类型小说的大繁荣。当代小说研究界也有相当一部分专家钟情于类型小说的研究,如范伯群等,他们作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但是,何为“类型小说”?“小说类型”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叙事形式”概念,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意义”概念?如何能找到一种可以内在地包含上述二者的小说类型学“范畴”系统?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明确回答。

葛红兵撰写的《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专著试图通过系统性理论思考,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实践针对性的类型学理论,为小说类型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该书以“建构中国小说类型理论,推进类型小说批评”为目的,提出超越“小说研究”沉迷于“历史描述”的现状,建构一种可以对小说进行深度“逻辑描述”的类型理论框架的构想。专著从对小说形态学、小说叙事学及结构主义小说学研究的经验总结出发,认为可以构建一种承续又超越上述诸家理论架构的“类型学”方案,并就此提出了“叙事语法”概念;作为对“叙事语法”概念的深化,葛红兵又进一步提出了“生成性成规”理论和“地方知识”理论,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同时支撑“类型”观念,并将之发展成方法论。该书还着重阐述了兼类、跨类、反类等概念,开启了小说类型学对小说类型嬗变进行宏观研究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对小说类型运动进行宏观历史描述的概念方案。

有了上述认识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寻找理论资源与经验支撑。张永禄的专著《类型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现代小说理论批评史,考察了鲁迅、严家炎、杨义、郑家建、施战军、范伯群、汤哲声、陈平原和许子东等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小说类型研究思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

历史参照系,作为借鉴的同时,还带来了大量具有深度启发意义的理论思考。

接着,我们探寻了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一个重要源头——普罗普的小说形态学,这是谢尚发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研究与中国小说类型学的方法建构》研究的课题,谢尚发对普罗普著作的“经典重读”让我们团队找到了很好的理论原点。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案帮助我们打开了小说类型学研究的思路,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普罗普的抽象模式隔断了逻辑和历史的联系,而只有逻辑没有历史的研究方案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这样,我们的研究方向就逐步离开了故事的功能架构层面,试图用“深层叙事语法”概念来深化我们的小说类型学理论研究,这个阶段我们比较典型的成果是谢彩的《中国侦探小说类型论》,这本书用此理论思维来研究侦探小说,带来了前人未见的许多闪光点。但是对于深层语法的过多重视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封闭和开放性不足。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些不那么“结构主义”的概念,这个过程极其漫长。时隔几年,直到“叙事成规”这个概念的发现,才让我们豁然开朗,这个概念让我们可以把小说的内部结构研究和外部文化关系的论述联系起来,达到内外平衡。叙事成规,不仅是叙事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成规中包含了小说类型作为“故事”的叙事语法内涵,同时也包含了小说作为“民族志、地方志知识”的叙事形态的文化语法内涵。此时,我们就可以把小说类型学上升到民族志、地方志的高度来看待,到这里我们的小说类型学找到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思路。

这个过程中许道军的《千秋家国梦——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类型研究》专著的撰写和杜建的《权力关系的多重变奏——官场小说

的类型学研究》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支撑,没有这些支撑和探索,我们的课题是不可能“结项”的。这个阶段,对具体小说类型的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的研究也被引入,尽管具体的成果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方法也已经基本成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把“类型指认”当做一种理论假设,当类型假设可以让我们看见别的理论看不见的东西时,这种假设的有效性就得到了验证。但是我们给出“小说类型”的定义,指认“某种小说为某个类型”,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小说类型进行简单演绎,真实的情形应该恰恰相反。小说类型研究更多地由下往上进行,更多地来自归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小说类型研究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由此我们建构了跨类、兼类、反类、变体、正体等概念,来研究小说类型的嬗变及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些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类型小说鉴别指认,而且更将拓展类型小说研究与批评的宏观关照能力。

当然,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对类型的指认曾经在“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之间犹疑,难以平衡。我们开过专题的讨论会,也写过多篇专题论文,这个时候赵牧的加盟给我们带来了《“后革命”:作为一种类型叙事》的研究案例,此书在我们团队内是最有争议的一部。“类型”作为一种方法,如何保持其有效的开放性?又如何保持其对“价值”、“思想”的关怀能力?这是此专著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思考。

由此,我们团队开始思考和关注“小说作为地方知识的叙事形态,其地方性意蕴正在丧失”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下小说的民族志意蕴正在消溃,这激发我们思考“在中国普通话的强势语境下,小说作为地方志,其表现地方生活的能力是提高了还是下

降了”等问题；另外，我们是否可以要求小说类型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空间类型诗学？“类型研究”如何有效地与上述“价值”问题相关联？类型研究如何在保持其“形式”关照力的同时，真正向“价值”问题开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总之，我们的研究还将继续进行，我们试图以类型学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一个总体性考察。也许我们能写出一部中国现代类型小说史，提出一套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中国现代类型小说分类方案；同时，在类型小说批评实践方面，我们还准备加强新生类型小说及跨类小说的研究，使我们的类型小说批评得以深化和升华。

葛红兵

2012年3月18日

目 录

绪 论	前车之鉴：官场小说研究概览	1
第一节	官场小说研究学术史的梳理评估	1
第二节	本论题研究之目的所在与意义旨向	12
第一章	何谓官场小说？	15
第一节	官场小说正名：小说类型学视野中的 官场小说	15
第二节	官场小说中的权力关系网	18
第二章	官场小说的源与流	29
第一节	官场小说的前身：谴责小说与黑幕小说	30
第二节	官场小说的开拓者：法制文学与 改革文学	38
第三节	反腐小说与官场小说：官场小说的 成熟化	43
第四节	官场小说的当代变体兼及网络官场小说的 新质	47
第三章	官场小说中的叙事成规探析	57
第一节	官场宏大叙事的深层意涵	57
第二节	官场小说的微观权力叙事	67
第三节	官场反讽叙事的解构策略	78

第四节	男性权力场域中的女性叙事	84
第四章	作为官场小说典型个案的深度描述	94
第一节	《羊的门》：平原大地上生出的权力崇拜	94
第二节	《国画》：“士人”与“官人”之间的距离	106
第三节	《首长秘书》：充满滑稽与丑怪的权力 世界	115
第四节	《诗遇》：权力陷落的旁观者对官场的 冷思索	124
第五章	官场小说的政治文化阐释	137
第一节	官本位意识：官文化的核心内涵	137
第二节	士人的心声：官场小说的士人情结	142
第三节	权与法的纠缠：在“人治”与“法治”的 夹缝中	150
第六章	官场小说的价值反思	160
第一节	作家的精神气质与官场小说的叙事成规	160
第二节	官场小说遭遇到的民族文化认同焦虑	169
参考文献		176

绪论 前车之鉴：官场小说研究概览

第一节 官场小说研究学术史的 梳理评估

正如官场小说在当代文学的勃兴,对官场小说的研究发展到今天,也已经形成了一派蔚为大观的学术局面。学者们主要将官场小说的题材范围划定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一批揭露官场腐败黑暗面、暴露官员以权谋私的小说创作上,王跃文、陆天明、张平、周梅森、阎真、肖仁福等作家是批评家所论述的主要对象。也有学者将官场小说的历史上溯到清末民初甚至是遥远的古代社会,然而也只是作为当代官场小说的铺垫一笔带过,我们却很难从中得出一条清晰的官场小说流变与衍生的历史脉络。对官场小说研究的兴盛并不等于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研究中雷同化、浅薄化、草率化的倾向并不少见。究其实质,笔者认为主要是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上的陈旧与千篇一律。

在对官场小说的研究状况做学术史梳理的时候,笔者没有将视野只是仅仅局限于当代。官场小说自有其类型的演变和更迭的一条线索,虽然研究官场小说打破时间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这条一百年以来的研究线索的梳理却能让我们得出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能够看出官场小说的得失及其大致的创作走向,从而更

好地应对当下官场小说异彩纷呈的创作现实。

一、清末谴责小说的大致研究状况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清末民初暴露社会罪恶的小说分为三个级别，“讽刺小说”居于首位，“谴责小说”居中，而“黑幕小说”为最下者，其中鲁迅对《孽海花》的评价尤其高，称其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力倡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对谴责小说的评价也很高，认为其是带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当代的学者在承继鲁迅、梁启超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展开谴责小说和官场小说的时间维度的比较，如申朝晖的《浅谈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系》，王艳荣的《也是一个文学话题——从谴责小说到反腐小说》。他们大都看出了官场小说和谴责小说在揭露官场黑暗内幕主题上的一致性，但是没有做深层次的探究。

二、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对黑幕小说的评价

自洋洋数百万言的《中国黑幕大观》刊行以来，对黑幕小说的争论就一直延续。对黑幕小说提出批评的大多是黑幕小说之外的新文学阵营中的人，陈独秀于1917年在其影响巨大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就对“黑幕”进行了批判，“盘踞吾人精神界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①。虽然陈独秀在文中并

^① 1917年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文章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作为其反封建文学的口号：“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旗手，他的姿态是极端激进的，对传统采取的是摧枯拉朽的否定态势，因此像黑幕小说这样不太激进、不太革命的文学形式，也自然成为其批评的对象。

无指涉具体的黑幕小说类型,但是他的新文学立场是鲜明的。对黑幕小说做出最早科学论述的可以认为是杨亦在其后发表的《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作者分别就黑幕小说“是否与世界文学之潮流相合”,“是否与近世社会之潮流相合”,“是否与人生问题相违背”,“是否与道德相冲突”这四个层面一一加以论述,最后给黑幕小说以正面的评价,称其是“普渡众生,指导迷途的利器”^①。在这场对黑幕小说的争论中,周作人1919年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论黑幕》一文在当时也影响极大,甚至这也是促成文学史长期对黑幕小说持贬斥态度的一个动因,文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揭起黑幕,并非专心要看这幕后有人在那里做什么事,也不是专心要看做那样事的是什么人,我们要将黑幕里的人,和他所做的事,连着背景,并作一起观。这是中国民族,事是他们所做的奸盗诈伪,背景便是中国的社会。我们要看这中国民族在中国现在社会里,何以做出这类不长进的事来。这所做的事,只是结果,不必详说”^②。很显然周作人是将“黑幕小说”看作是一种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的历史材料,而对“黑幕小说”作为小说的艺术性则基本没有评价,因此黑幕小说依然是被新文学阵营的人视为一种反面教材。

罗家伦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说:“中国近年来小说界,似乎异常发达。现在笔者以分析的法子,把现在中国新出的小说分为三派,第一派是罪恶最深的黑幕派,第二派是滥调四六派,第三派的小说比前两种好一点,是笔记派。”在寻求黑幕小说发达的原

① 黄森学. “黑幕小说”研究(之一) [J]. 黄石教育学院学报, 2003(4).

② 魏绍昌, 吴承惠.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 史料、作品部分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因时,他在最后说“征求的人,杜撰的人,莫不借了‘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招牌,来实行他们骗取金钱教人为恶的主义”^①。罗家伦对黑幕小说的评价比周作人更为偏激,“黑幕小说”已经成为其除之而后快的毒草。由上述各家评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体评价,即在黑幕小说勃兴的时期创作上的盛行和批评上的指斥很不相合拍,而当时各评家也多把这种盛行的局面看作创作者为迎合市场的需求搞的一种卖文手段。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评判显然是极为幼稚武断的,这近乎于一种无视读者阅读接受的教化式批评,而没有更多理性的和中肯地探讨。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官场小说研究的新发展

解放后直到“文革”结束这“十七年”,可以说是官场小说研究的一个低谷。当时研究者或是对官场小说众口不提,或是将之斥为旧社会旧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毒草。究其原因,显然当时的阶级论和政治批评占据文坛的主流话语地位,是很难容许有异样的声音存在的。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官场小说的研究形成一种蔚为大观的局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种研究倾向,并且每一种研究倾向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对官场小说的研究漏洞,具体如下:

1. 对官场小说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及其缺陷

社会历史批评主要是立足小说文本外部,以一种文化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官场小说,这种研究方法依然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延续。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对官场小说的成因、缺陷以

^① 魏绍昌,吴承惠.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史料、作品部分[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及未来期待等方面。如孟繁华先生这样来论述官场小说的繁盛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的异化导致的官僚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它也就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①。官僚腐败和商业文化的联姻促使官场小说的繁荣，不管是腐败还是市场，都还不是官场小说的根本因素，可见作者是立足于广阔的社会视野来俯瞰官场小说的。再看另一种大致相同的成因分析方法，“当代官场小说迎合时代文化语境，依然是小说创制之大宗，而且持久不衰，至于泛滥；加之，文学在当代传媒化，大众媒体出于大众娱情的文化商业动机通过几乎所有的媒介渠道对其鼓吹宣传不遗余力，读者受众几乎无法逃避地被迫接受，或有一些读者似乎在阅读中养成从中‘窥探’黑幕之类的猎奇心理，所以听闻阅读也多”；^②作者分别分析了特定的时代语境对官场小说的需求，市场机制与商业消费对官场小说的催化作用，以及读者接受心理对官场小说的暗中引导这三方面的原因。其实不管是读者的接受心理，还是社会媒体的鼓吹效应，这些都是官场小说兴盛的外因。然而官场小说除了这些外部因素之外，官场小说自身的类型演替，官场小说文本内部深藏的叙事话语与叙事成规也是官场小说长盛不衰的原因，而笔者未见这方面较为详尽的论述。

有的学者在这方面也着力指出当下官场小说存在的缺陷，学界的普遍共识也大致分为以下几点：官场小说作家的媚俗

① 孟繁华. 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J]. 粤海风, 2002(6).

② 王建仓. 当下官场小说的叙事症候[J]. 小说评论, 2008(6).